



历史读本

真情回忆

提起“文明”，我们会想起古代四大文明，其实早期文明并不止于“四大”，只不过多数文明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衰落了，是为“失落的文明”。我们常讲，中华上下五千年，说的正是中华文明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独具特性的文明极为少见。但作为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我们同时也面临如何理解、看待自己的历史，如何接续传统创造现代的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就给普通大众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遗迹，邀请负责一线勘探的考古学者，讲述考古现场的发掘经历和文明背后的故事。经由此书，也可促使读者思考我们自身文明的价值、思考中国考古之于世界文明的意义。

# 做中国考古 也是在做世界考古

□李零

1949年后，中国的考古发现，年年大丰收，就连人称“文化浩劫”的十年，都是大丰收，不仅我们自豪，世界上的考古学家也刮目相看。于是，中国考古界便有了“中国学派”崛起的呼声。什么叫“中国学派”？主要是两条，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一条是中国特色。20

世纪下半叶，美国考古学独步天下，无论“过程考古学”，还是“后过程考古学”，都是非马克思主义指导，带有美国特色的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虽有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一支，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美国考古学的特色有二：

第一，美国远离欧亚大陆，跟古典学、艺术史、近东考古扯不上，它以美洲印第安文化为对象。美洲考古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它与非洲、大洋洲的考古更接近。它的参考书，不是历史文献、铭刻材料，而是民族调查、民族志，考古属于人类学。

第二，美洲考古以史前为主，而史前考古，无书可读。考古学家更热衷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玩理论、玩方法。认为考古不光是挖，不光是记录、不光是编年排序，重在思考，重在阐释，重在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复原。这种风气是在美国特有的环境下被逼出来的。

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提到，这一百五十年是从1800年到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1970年是后来补写的。西方考古学家说中国考古落后，主要是指1949—1979年，他们不来，我们不去，没有沾上美国考古学的“仙气”。但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他们也同样错失了研究中国考古的机会。

我们到底落后了西方多少年，有人说是100年，这未免有些夸大。我国的考古，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从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算起，到今年为止，总共只有92年。落后100年，岂不等于零？

他们说我们落后，其实不在于田野技术，甚至也不在于科技手段，主要是说，我们没有理论，即便有，也是坏理论。

美国考古学的理论，经张光直介绍、俞伟超宣传，现在如日中天。马克思主义是个好理论，非常前卫的理论，但在我国，有着颇多曲解。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一个叫唯物史观，一个叫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立足经济学研究的唯物史观为指

导。阿尔都塞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直观唯物主义，其特点是强调行动，在实践中认识问题，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此外，它也不是“五种社会形态说”，马克思没有发明过五种社会形态。亚细亚—古代（希腊、罗马）—日耳曼（包括民族大迁徙、中世纪和现代）是19世纪历史学的“老三段”，三段即代表三种历史文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按这个“老三段”组织他的正反合。马克思只是把这个“老三段”视为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阶段，并没有说全世界都得按这个模式发展。

唯物史观之长在于宏观大视野和社会史研究。20世纪的考古学，上半叶是以柴尔德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下半叶是以宾福德为代表的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柴尔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他的两个革命说（农业革命、城市革命），至今颠扑不破。新考古学未必全新，旧考古学也未必一无是处。

至于民族主义，老一代的中国学者要重修国史、续写家谱，恐怕也不能按美国的政治正确性一概来从负面理解。1949年以前，中国备受欺凌，任人宰割，反抗一下有什么不对？被压迫民族以斗争求解放，反抗殖民统治，反抗帝国主义，有十足的正当性。中国，地上史料那么多，地下史料那么多，不想求外国人帮我们修古史，像埃及、伊拉克、伊朗那样，打算自己动手找材料，何足怪哉？1949年以后，中国被列强围堵制裁，民族主义也是必然反应。我们对中国近百年来的民族主义应抱“了解之同情”。

研究世界文明，欧亚大陆是“重头戏”。欧亚大陆，亚大欧小。欧洲面积只有亚洲的四分之一。古典作家说的亚洲，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小亚细亚、伊朗高原。殖民时代，亚洲的概念东扩，进一步分为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北亚六大块，每一块都很重要。

欧洲人对亚洲的认识是由近及远的，西亚考古、中亚考古、南亚考古、东南亚考古，他们很熟悉；但东亚考古、北亚考古却在中、蒙、俄三国外加韩、日两国的范围内，这一范围占了亚洲的一半多，他们对此领域相对隔膜。

罗森教授经常跟西方学者讲，中国太重要。这个重要是对世界重要。我们要知道，欧亚大陆东半，中国是文明气旋搅动天下的风暴眼。张光直说，中国考古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改写世界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应该对世界历史做出贡献，也能够对世界历史做贡献。我非常赞同他对中国考古的历史定位。

中国考古是世界考古的一部分。我们做中国考古，其实也是在做世界考古。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一定前途无量。

（节选自《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  
李零 刘斌 许宏 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善于以长篇小说编织人性史诗的菲利普·罗斯在1991年意外地出版了一部纪实作品——《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视线凝聚的焦点，不再是广阔的社会、宏大的命题，而是罗斯刚刚去世的父亲，一个平凡、卑微的犹太老头。临终前的日子，他的一生像一条浸透了琐碎往事的河，在他和他的作家儿子眼前，半明半灭地流过。

## 父亲的“遗产”

□彭伦

在菲利普·罗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遗产》是其为数极少的非虚构作品。这篇篇幅不长的书并非他最重要的作品，但无疑是气质最为独特的作品之一。作为小说家，罗斯喜欢将自己隐藏在小说中，以“内森·祖克曼”或是以“菲利普·罗斯”之类的小説人物面貌出现，主人公常常是隐姓埋名的作者本人。唯独《遗产》，他无可遁逃，因为这一次，他写的是他自己的父亲。

人到中年，大多数人必须面对父母日渐老去、相继凋零的无奈而痛苦的现实。罗斯也是如此。1981年他正当48岁壮年时，母亲突然病逝；时隔七年，他86岁的老父亲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再也难以恢复以前的模样，因为他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菲利普·罗斯从为他联系治病，试图帮他物色犹太老人居住社区，乃至手术后照顾他生活，最后送终，完成为人之子的责任，逐渐真正体会到自己对父亲深沉的爱。所谓“遗产”，正是父亲一生所给予他的爱，他要在父亲去世之前，用儿子对父亲的爱来报答。

可以说，我们眼前的这部《遗产》，就是菲利普·罗斯在父亲身后献给他的礼物。他自己在该书结尾时透露，“在他生病、将死的时候，我一直在写”这本书。

在美国犹太裔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父亲这个角色常常是这样几种类型：要么是在喋喋不休的强势母亲“淫威”下显得无能无用的父亲，或者是与子女对抗的家庭暴君，再就是已经去世或者离婚或者出走，在书中并不出现的父亲。美国民间对犹太父亲似乎还有一种成见。一个古老的笑话这样说：有一个犹太小男孩放学回到家，告诉妈妈他在学校排练的一出戏里被分配扮演一个角色。“太好了！演什么？”小男孩说：“我扮演犹太人爸爸。”他母亲阴沉着脸说：“回去告诉老师，你要演说话的角色。”

但菲利普·罗斯笔下的父亲完全是另一种形象。相信每一位读者读完《遗产》，都会对赫曼·罗斯这个固执、有趣甚至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犹太老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赫曼·罗斯的父亲从波兰移民而来，他本人在美国出生，自小家境贫寒，上了几年学，十二岁就得外出找工作贴补家用，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从底层做起，靠着勤奋拼搏逐步升迁，做到区域经理而退休。在本书结尾处，菲利普·罗斯用一个梦境总结了父亲的一生：“整个家族历史被压缩成梦境中的一段段无声电影胶片：他人生的每一个主题都被压缩其中，每一件对我和他都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从他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开始，到他为了生存、为了抵抗重重阻力走向成功而苦苦挣扎抗争——在穷困的童年时代他被剥夺了上正规学校念书的权利，作为犹太人他又在那家歧视犹太人的保险业大公司工作——一直到他因为脑瘤而步步蜕变，走向衰弱。”

辛苦的生活将老罗斯锤炼成这样一种性格：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到纽瓦克贫民区敲开黑人家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深夜带着一身廉价食用油的酸味儿回家；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等着别人看完传给他；固

执而自以为是得又让人生气，连招呼都不打，就把儿子少年时代辛苦积攒的邮票送人。“他过分的固执，或者说固执得过分，几乎让我母亲在她最后几年崩溃：自他六十三岁退休以后，她那有滋有味的家庭妇女的独立生活，就全让他烦人的颐指气使给毁了。”然而他又知足的，满足于这份靠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工作和公司给他的退休金，丝毫不在意儿子菲利普所感觉到的大都会公司歧视犹太人的潜规则……

《遗产》的副标题叫“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这本书并没有多少故事可言，震撼读者心灵的，是菲利普·罗斯在照顾父亲过程中的大量心理独白和日常细节，以及不断闪现的这个普通犹太人家庭生活的记忆碎片，时而幽默，时而忧郁，时而深沉。经过一次手术后，菲利普·罗斯把父亲接到自己家中照顾。老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都是尿，一片狼藉。儿子平静而细致地打扫父亲留下的烂摊子，“我踮着脚尖回到他安睡的卧室，他还有呼吸，还活着，还与我在一起——这个永远是我父亲的老人，又挺过了一次挫折。想到他在我上来以前勇敢而可怜地想自己清洗这个烂摊子的努力，想到他为此而羞愧，觉得自己丢脸，我就感到难过。现在，既然此事已经结束，他又睡得这么香，我想在他死以前，我就不能要求自己得到更多了——这，也是对的，理应如此。你清洗父亲的屎，因为你必须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过去没有体会的感觉，现在都体会到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这点：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在脑后时，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我提着那臭烘烘的枕套下楼，放进一只黑色的垃圾袋，扎好，再拎起袋子走到外面的汽车旁，倒进准备送到洗衣房的车尾行李箱里。至于为什么这是对的，并且理应如此，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既然这件事情做好了，那么，遗产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清洗象征着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它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在这样的细节面前，任何宗教、种族、文化的背景都淡去了。作者为父亲所做的一切，我们终有一天也将面对。正如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偶然间在电视剧《空镜子》中看到片中的父亲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离开人世，突然想到自己终将面对类似的一幕，不禁潸然泪下。



《遗产》  
[美]菲利普·罗斯 著  
彭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点也不逊于发现尼尼微和特洛伊古城的意义。  
学者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三星堆的发现——三星堆出土文物铜立人像。即便是西方